

汪藻《裔夷谋夏录》再探

李京泽

内容摘要:汪藻于南宋初所著《裔夷谋夏录》是一部记载辽宋金易代史事的重要文献。本文探讨该书版本源流,厘清此书现存六个抄本之间的关系,指出上图、南图和静嘉堂藏本皆抄成于清初,后两者可能直接出自某一明末清初抄本,而此本又与上图本皆源出明中后期的一个祖本。此书虽以“杂糅抄撮”为主,但亦可见汪藻史笔,尤以卷一描述女真源流风俗的部分最为明显。该书保存了关于辽代女真和辽宋金易代时期的重要史料,为南宋官私文献广泛采择,对宋元史学史、辽宋金更替史和反思流行的女真民族史叙事都有重要价值。

关键词:汪藻 《裔夷谋夏录》 版本源流 编纂体例 文献价值

汪藻(1079-1154)所著《裔夷谋夏录》是一部记载辽宋金易代之际女真兴起、灭辽攻宋史事的重要文献,然今传本皆伪题“刘忠恕撰”,长期不为人所重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虞云国先生于日本静嘉堂发现《裔夷谋夏录》抄本一部,并撰文介绍了该书的相关情况^①,但未引起国内学界的广泛注意。直至2012年,《全宋笔记》第五编收录此书,黄宝华先生以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为底本做了点校整理^②,才使得《裔夷谋夏录》一书广为人知。2016年,苗润博博士发表《有关〈裔夷谋夏录〉诸问题的新考索》一文(以下简称“苗文”),详细介绍了此书源流和存世诸抄本的情况,认定《裔夷谋夏录》是南宋著名史家汪藻所作,原名《金人请盟背盟本末》,成书于绍兴九年(1139),是

①虞云国:《静嘉堂藏〈裔夷谋夏录〉考略》,《书目季刊》1995年第29卷第3期;又收入氏著《两宋历史文化丛稿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1年,第487-498页。

②旧题刘忠恕著,黄宝华点校:《裔夷谋夏录》,《全宋笔记》第五编,大象出版社,2012年,第69-110页。按该点校本存在据《三朝北盟会编》、《契丹国志》改原文以及文字失校、误校的情况。本文引用《裔夷谋夏录》文字,皆据诸抄本予以回改和补正。

汪藻为备修《日历》而整理的素材,后又自秘府中抄出,流传于世;而汪藻后来又将此书改名为《裔夷谋夏录》,与源自官本者并行,今本《裔夷谋夏录》系出自汪藻家藏本系统^①。苗文纠正了前人对此书作者、来历、史源等关键信息的错误认识,乃今日所见最为详备的研究。《裔夷谋夏录》既是早于《日历》、《实录》等官修史书的原始材料,其重要性自不待言,但以苗文为代表的现有研究仍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:一是今存《裔夷谋夏录》诸本的版本源流,二是该书的编纂体例和文本源流,三是该书多方面的文献价值。本文即就这三个方面进行讨论,以期能对《裔夷谋夏录》一书有更深入的认识。

一、今存《裔夷谋夏录》诸本源流发覆

《裔夷谋夏录》现存六个抄本:上海图书馆藏有两部,分别为一清抄本(简称“上图清抄本”)和一民国抄本(简称“民国本”);南京图书馆(简称“南图本”)、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(简称“北师大本”)、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(简称“台北本”)、日本静嘉堂(简称“静嘉堂本”)各藏有一部。苗文对这六个本子的判断是:六者前皆有胡潜序文、题刘忠恕撰,自第二卷开头至“百官谒殿称贺”以下皆残,当出于同一版本系统;从避讳情况看,上图清抄本当抄成于清初,静嘉堂本、南图本成于乾嘉时期;北师大本和台北本均书有题记,指明二本乃李文田、孔昭熙分别抄自上图清抄本,并称上图清抄本乃清末文廷式于杭州书肆购得,源流清晰。民国本晚至民国,与静嘉堂本、南图本三者卷末皆有“《谋夏录》卷第三终”字样,当有共同的祖本^②。苗文的判断大体无误,不过,对南图本、静嘉堂本的认识仍有可商之处。

苗文言二本“皆避乾隆讳,而不避道光讳,当成于乾嘉时期”^③,笔者检视后发现,二本中涉及乾隆讳“弘历”者不多,一是提及“道宗弘基弟弘本之子”时,弘字不避讳;二是天祚帝诏书中“古今定论,历数难移”一句,上图清抄本作“曆”^④,而静嘉堂本、南图本皆作“歷”。估计苗文是根据“歷”字判断二本避乾隆讳。然而,“历数”一词,向来“歷”、“曆”两字皆可通用,不少乾隆以前的刻本也有作“歷”者。反倒是“弘”字,避讳时或缺末笔之点,或改写作“宏”,在乾嘉时期避讳得相当严格^⑤。南图本、静嘉堂本皆不避“弘”字,判

①苗润博:《有关〈裔夷谋夏录〉诸问题的新考索》,《文史》2016年第2辑,第125-148页。

②苗润博:《有关〈裔夷谋夏录〉诸问题的新考索》,第136-137页。

③苗润博:《有关〈裔夷谋夏录〉诸问题的新考索》,第137页。

④此处《全宋笔记》点校本作“歷”,未出校。《裔夷谋夏录》卷二,第107页。

⑤详见陈垣:《史讳举例》,中华书局,2012年,第225-227页。

断为乾隆以前的本子较妥当。

而南图本、静嘉堂本、民国本三者的关系,确如苗文所言有一共同祖本。由于现存的六个抄本均不精审,文字错讹、倒误、脱漏比比皆是。对比这些错讹脱漏之处,是判断诸本关系最直接的方法。笔者逐一核对诸本文字后发现,南图本、静嘉堂本、民国本三者的讹误脱漏情况十分相似。如“臣属契丹二百余年”一句^①，“二百余年”三者皆作“一百余年”；“前二十人重甲，持戈矛；后三十人轻甲，操弓矢”句（第75页），“二十人”、“三十人”三者皆作“二千人”、“三千人”，可见三者确实同源。至于三者之间的具体源流关系，苗文并未深究，其实也有迹可循。经检核，民国本错讹之处与南图本高度重合，如“世袭节度使封号，兄弟相传”一句（第75页），南图本与民国本皆有“节度使”、“兄弟湘传”之误；又如“女真众才及万”一句（第76页），南图本、民国本皆讹作“女真众寸及方”。不过，也有南图本不误而民国本误之处，如“职皆曰勃极列，盖纣官也”一句（第75页），民国本“官”讹作“宫”；“坐之廊庑，赐以酒炙”句（第76页），民国本误作“物以酒炙”。此外，民国本还有在南图本基础上“错上加错”之例，如“入谷口至束沫江”一句（第74页），南图本误作“东沫江”，而民国本则进一步误作“东沐江”。鉴于以上情况，疑民国本或直接抄自南图本。

静嘉堂本的错讹脱漏虽少于南图本，但亦多有重合之处。除上引外，还有如“耳垂金环，留脑后发，以色丝系之，富人以金珠为饰”一句（第75页）中，二本皆有“耳乘”“珠金”之误。然亦有南图本不误而静嘉堂本误者，如“于是郭药师等杀罗青等数十人以献”一句（第92页），“于”字静嘉堂本误作“丁”；“然尚虑将输及军需、守具、板筑之类”句（第100页），“将”字，静嘉堂本误作“抒”。另外还有南图本、静嘉堂本互有歧异之处，如“乃言俟再来整会”句（第90页），“俟”字，南图本作“使”，静嘉堂本作“候”。这些情况表明，静嘉堂本与南图本可能并无直接抄袭关系，只是同源而已。

再将南图本、静嘉堂本与上图清抄本比较，三者存有一些共同的讹误。如“世居混同江之东，长白山鸭绿水之源，南邻高丽，北接室韦，西界渤海、铁离，东濒海。《三国志》所谓挹娄，元魏所谓勿吉”一段（第74页），三本皆作“世居混同江之东，濒海。《三国志》所谓挹娄，元长白山鸭绿水之源，南邻高丽，北接室韦，西界渤海、铁离，东濒海，魏所谓勿吉”。又如诸本引郭药师上表，其中“允属僊苏之望，举怀赖庆之思”一句（第108页），“僊”字后，皆衍“行其封爵懿号，一切仍旧，呜呼，仰循典故，允属僊”十九字，系前文天祚帝

^①《裔夷谋夏录》卷一，第74页。为免注释繁冗，本节下文引《裔夷谋夏录》皆于正文中括注页码。

诏书之重出。这种明显的共同倒误和衍文,显然是三本出自同源的力证。但除此之外的大多数文字讹误,上图清抄本与南图、静嘉堂二本却不相类,且有上图清抄本有误而后二者不误之例。如“悉发取金银珠玉器物”一句(第91页),上图清抄本于“金”字后衍一“玉”字;又“尊天祚为太上皇帝”一句(第93页),上图清抄本作“尊天祚为太子上皇帝”,此二处南图本、静嘉堂本皆不误。可见南图本和静嘉堂本恐非直接抄自上图清抄本,而是依据另一个已经散佚的本子,这个抄本又与上图清抄本共同源出一个更早的版本,此即为今存《裔夷谋夏录》诸抄本之祖本。苗文对诸抄本共有的“胡潜序”作过分析,推测作序者当为明中后期人^①。如是,则该祖本的形成不会晚于明中后期,而南图本和静嘉堂本直接依据的某抄本则可能抄成于明末清初(参见图1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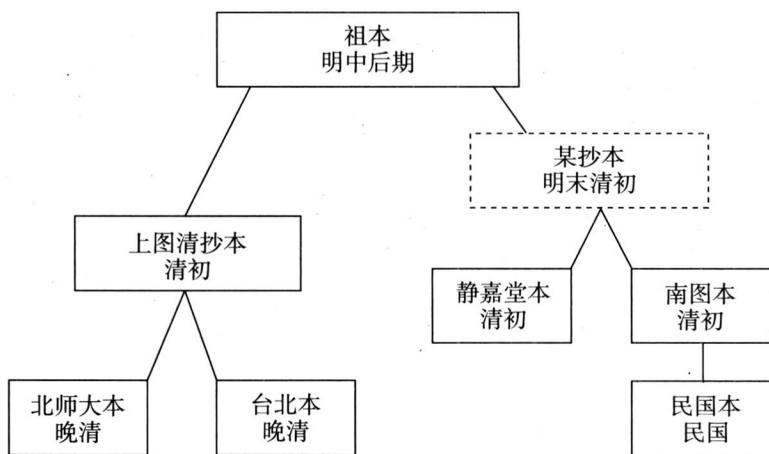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现存《裔夷谋夏录》诸抄本关系示意图

经过上文的讨论,今本《裔夷谋夏录》六个抄本的关系当如图1所示。该书南宋绍兴九年成书后,至晚到明朝中后期已经形成了一个书前混入“胡潜序”,作者伪题为“刘忠恕”的本子。该本至清初时分化为上图清抄本、静嘉堂本和南图本。至清末,李文田、孔昭熙分别抄录上图清抄本,形成了台北本和北师大本。而民国时人又抄录南图本,是为民国本。总之,《裔夷谋夏录》自南宋流传至今,实际仅剩一个一卷半的残本。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一文献、发掘其价值,是本文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。

二、《裔夷谋夏录》的编纂体例与文本源流

《裔夷谋夏录》原名《金人请盟背盟本末》,编成于南宋初年,早于官修《日历》、《实录》,自有其史料价值。不过严格说来,它其实是汇编诸书而成

^①苗润博:《有关〈裔夷谋夏录〉诸问题的新考索》,第136页。

的,并非“一手材料”。因此,汪藻究竟如何处理种种纷繁错杂的史料,采用何种体例编纂此书,对于探寻此书史源、理解此书价值,有重要意义。

对于这个问题,苗文的看法是:“汪藻的编纂办法也是一样大段抄录、简单连缀,而并未对所有材料加以真正的整合,用自己较为统一的文字将其呈现出来。”苗文敏锐地发现了《裔夷谋夏录》关于女真灭辽史事的叙述与《契丹国志》等书中保存的《金人亡辽录》文字近似,且仍大量保留辽朝年号,故据此认为汪藻“在编纂此书时,实际上是对不同的史料作了较为机械地剪裁与拼接……最终采取了杂糅抄撮,而非融会贯通、自为一书的编纂方式……如果着眼于历史编纂学,汪藻的上述做法自然无甚可取。不过,如果着眼于史料学,这样相对机械的编纂方式刚好可以保持史料的原始面貌”^①,诚为确论。不过,苗文之说仍有进一步补正的余地。笔者注意到《裔夷谋夏录》中亦有可见汪藻史笔之处,并非全盘照抄原始材料。

从内容性质上看,《裔夷谋夏录》可分为两个部分,一是卷一起首至“天祚改乾统十一年为天庆元年”句,记述女真风俗源流、金人初兴、北宋初与女真的往来等;其后则主要记辽金战争、宋金盟约、金人背盟。在处理后者时,汪藻正如苗文所指出,以杂糅裁剪原始材料为主;但对于前者,汪藻则会将多种不同来源的原始材料重新拼接,形成一套全新的文本逻辑,值得注意。举例如下:

《裔夷谋夏录》卷首言:“金国本名朱里真,番语讹为女真,或曰虑真;避契丹兴宗真名,又曰女直。肃慎氏之遗种而渤海之别族也,或曰三韩辰韩之后。姓挈氏,于夷狄中最微且贱。唐贞观中,靺鞨来中国,始闻女真之名。”^②此段首句介绍女真的不同名号,第二句列出对女真源流的不同说法,第三句记女真姓氏、初次与中原王朝的接触等,层次分明,逻辑清晰。其实,本段是汪藻将不同原始材料有机拼合而成。“虑真”这一译名、“渤海之别族”和下文“姓挈氏,于夷狄中最微且贱。唐贞观中,靺鞨来中国,始闻女真之名”的说法,又见于《宋会要辑稿·蕃夷类·女真国门》,作“女贞,东北别国也,盖渤海之别种,本姓挈。唐贞观中,靺鞨来朝,中国始闻女真之名。契丹谓之虑真”^③。根据孙昊的考证,《宋会要·蕃夷类·女真国门》的文本应出自北宋仁宗时成书的《庆历国朝会要》,史源或为北宋真宗朝陈宽所上两

①苗润博:《有关〈裔夷谋夏录〉诸问题的新考索》,第141页。

②《裔夷谋夏录》卷一,第74页。

③徐松辑:《宋会要辑稿》蕃夷三之一,中华书局,1957年,第7712页。

卷《高丽、女真风土朝贡事仪》^①。汪藻将“契丹谓之虑真”一句增补到“番语讹为女真”之后,在“渤海之别族”前加入“肃慎氏之遗种”,把“本姓挐”一句修补到不知出自何处的“或曰三韩辰韩之后”句后,构成一完整的文本。换言之,本段正是汪藻以自己的文字“融会”当时流行的女真名号、族源诸说的结果。

又如,《裔夷谋夏录》卷一:“人皆辫发,与契丹异。耳垂金环,留脑后发,以色丝系之。富人用金珠为饰,男子亦衣红黄,与妇人无别。无常居,善为鹿鸣,呼鹿而射之,生啖其肉。嗜酒而好杀,醉则缚而俟其醒,不尔杀人,虽父母不辨也。无文字,与契丹言语不通,赋敛调发皆刻箭为号,事急者三刻。”^②其中“无常居”至“虽父母不辨也”的描述,实际出自五代时人胡峤所作《陷虏记》:“又东,女真,善射,多牛、鹿、野狗。其人无定居,行以牛负物,遇雨则张革为屋。常作鹿鸣,呼鹿而射之,食其生肉。能酿糜为酒,醉则缚之而睡,醒而后解,不然则杀人。”^③《宋会要辑稿·蕃夷类·女真国门》中也有类似内容,而《裔夷谋夏录》该段上下文的其他内容却不见于二书。显然,汪藻在面对多个记述女真风俗的材料时,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将不同材料串联起来,形成一逻辑完备的“独创性”文本。

又如记女真用兵之法:“其用兵,则戈为前行,人号曰硬军,人马皆全甲,刀槊自副,弓矢在后,设而不发,非五十步不射,弓力不过七斗。箭镞至六七寸,形如凿,入辄不可出,人携不满百。队伍之法,伍什百皆有长……自主帅至步卒皆自驭,无从者。以粟粥燔肉为食,上下无异品。国有大事……”^④此段材料,“队伍之法”之前与范仲熊《北记》类似:“皆枪为前行,号曰硬军,人马皆全副甲,腰垂八棱棍棒一条或刀一口,枪长一丈二尺,刀如中国屠刀。此皆骁卫之兵也。弓矢在后,设而不发,弓力不过七斗,箭多者不满百只。”^⑤由此可见,《裔夷谋夏录》该段记述显然主要采自《北记》,并文饰了一些口语化的词汇^⑥。值得注意的是,《裔夷谋夏录》“人携不满百”之后的内容不见于《北记》,而“队伍之法”之后的“粟粥燔肉为食,上下别无异品”一句,又见

①孙昊:《辽代女真族群与社会研究》,兰州大学出版社,2014年,第126页。孙昊:《〈宋会要·蕃夷类·女真国门〉笺注》,《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》,2018年,第188页。

②《裔夷谋夏录》卷一,第75页。

③《新五代史》卷七三《四夷附录二》,中华书局,1974年,第906-907页。

④《裔夷谋夏录》卷一,第75-76页。

⑤徐梦莘: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九九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730页。

⑥《裔夷谋夏录》中“非五十步不射”、“箭镞至六七寸,形如凿,入辄不可出”两句不见于《会编》所引《北记》,如非《会编》引用时脱漏,当是汪藻采自其他文献。

于《北记》，作“粘罕军至步卒，皆粟米粥或烧猪肉，别无异品”^①，其后的内容则又不见。若不留意，很容易误认为《裔夷谋夏录》该段出自一段完整的文献。若作者只是草草拼接原始材料，又怎会出现这种“穿插”式的抄录呢？推绎本段的写作目的，所谓“自主帅至步卒皆自馭，无从者。以粟粥燔肉为食，上下无异品”云云，是为了说明女真将兵一体、军队精强，不像宋朝军队那般孱弱腐败，是作者对宋军不敌金军的一种反思。因此，这段文字是汪藻在阅读了多种原始文献后，分别采择了不同材料，使被描写的对象显得更为丰满，以达到写作目的。这种手法与一般的史书编纂毫无二致。

推其原因，由于女真骤起于白山黑水之间，与之接触甚少的宋人对这支“强虏”不甚明了，有识之士自然会尽力搜集有关女真的源流、风俗、制度等情报并予以总汇。如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三在记述金朝使者李善庆至汴京后，用了整整一卷篇幅记述女真源流、风俗、语言和女真金朝建国前之事迹等等，远较《裔夷谋夏录》详细，几乎可视为一篇首尾完整的女真传记。根据邱靖嘉的研究，该卷是徐梦莘依己意根据《金人亡辽录》、《松漠记闻》、《裔夷谋夏录》等较为原始的材料加工改编而来^②。虽多有粗疏误植之处，却可见徐梦莘搜集、汇总女真相关史料的努力。从《裔夷谋夏录》来说，汪藻应有和徐梦莘类似的关怀，而为徐氏之先声。总之，汪藻处理《亡辽录》、《北记》、《宋会要》等诸多史料中有关女真记载的手法，恐怕不是苗文所言“杂糅抄撮”所能概括，反倒颇有“融会贯通”之意。从上文的分析看，《裔夷谋夏录》所记女真风俗、源流，实际出自不同时代的文献，反映的并非一时一地之史事和观念；若因文字的完整性，将《裔夷谋夏录》所记一概视为南宋初年的情况，便难免出现纰漏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使是“杂糅抄撮”比较严重的第二所部分，也并非完全看不到汪藻之史笔。《裔夷谋夏录》卷二记马扩出使耶律淳政权后，耶律淳政权派使者王介儒等与之同回：“翌日，同介儒、仲孙行，见数辈疾驰而北，云：‘昨日又胜南军，往燕京献捷。’介儒曰：‘两朝通和岁久，戴白不识兵革，今一旦如此，宁不怆然。南朝每谓燕人思汉，不言燕人属契丹且二百年，岂无许久君臣父子之情？安得妄兴士马，自兹战斗，生灵何辜！’”^③本段源自马扩《茆斋自叙》，见于《会编》。而《茆斋自叙》在本段之后，实际上还有一段马扩的反驳之语：

①徐梦莘：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九九，第731页。

②邱靖嘉：《女真史料的深翻与检讨——〈三朝北盟会编〉卷三研读记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2019年第2期，第195-229页。

③《裔夷谋夏录》卷二，第103页。

仆答曰：“兴废殆非人力，今者女真逼燕，燕人如在鼎镬，皇帝念故疆旧民，不忍坐视，是以兴师援救。若论父子之情，谁本谓的父耶？知有养父而不知有的父，是亦不孝也。”介儒笑而不答。^①

按照马扩的写法，他的反驳为宋朝伐燕保留了一丝“道义”的颜面。然而，汪藻编纂《裔夷谋夏录》时，北宋政权已然覆灭，当初“收复燕云”的伐燕大计，于南宋初人眼中不过是童贯等“奸党”的“误国”之举。因此，在采择《茆斋自叙》时，汪藻将马扩的反驳隐去，使得王介儒对宋方伐燕不道的攻击显得掷地有声，仅删一句便同原书效果迥异，或许暗含了汪藻自身的政治观点。

从以上例证来看，汪藻编纂《裔夷谋夏录》虽多“杂糅抄撮”，同时亦含“融会贯通、自为一书”的追求，这对我们准确定位和利用此书至关重要。古代史书的编纂者越高明，今日的史学家便越需保持警惕。若认为《裔夷谋夏录》全篇皆是大段照抄原始文献，乃至为简单的资料汇编，而不认真考辨史源便整段征引的话，便有可能埋下隐患。因此，在征引本书时，还须核查《三朝北盟会编》、《契丹国志》等相关史书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下面即在苗文的基础上，对《裔夷谋夏录》史源以及与他书所记相近内容的源流问题加以概述。

就笔者管见，《裔夷谋夏录》引用材料大致如下：史愿《金人亡辽录》、马扩《茆斋自叙》、赵良嗣《燕云奉使行程录》、范仲熊《北记》、封有功《编年》（又名《封氏编年》）、《宋会要》以及其他诏令奏状之类的宋朝档案资料。其中，关于女真灭辽史事大多采自《金人亡辽录》，而宋金合盟、金灭北宋史事，则多采自宋方文献。在引用诸书时，汪藻并不标明出处，而是将诸书内容拼接在一起，形成首尾相衔的完整文字。

除此之外，尚有《三朝北盟会编》、《宋会要辑稿》、《契丹国志》、《大金国志》等书，存在大量未言明出处，却同今本《裔夷谋夏录》内容雷同的文字。其中有的直接抄自《裔夷谋夏录》，有的则与此书有共同史源。《契丹国志》、《大金国志》二书，皆元代书贾拼凑杂抄而成^②，内容同《裔夷谋夏录》相类之处，或直接摘录此书，或抄自《金人亡辽录》，前人已有较好的研究^③，兹不赘述。

而《宋会要》的情况比较复杂。从《宋会要辑稿》来看，与《裔夷谋夏录》内容相近之处，除了《蕃夷类·女真国门》所载真宗以前女真遣使来宋事，当

①徐梦莘：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八，第55页。

②详见刘浦江：《〈契丹国志〉与〈大金国志〉关系试探》，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》第1辑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；后收入《辽金史论》，辽宁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357-372页。

③详见高宇：《〈契丹国志〉研究》，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12年。

属《裔夷谋夏录》引用《庆历国朝会要》；其余皆是金灭辽事，见于《蕃夷类·辽门》。该部分文字与今本《裔夷谋夏录》高度相似，而与《契丹国志》等互异，当直接改编自《裔夷谋夏录》。如《辑稿》“天祚以萧奉先弟殿前都点检萧嗣先帅奚、契丹、禁军、土豪五千余人，十月，屯出河店，临白江，与宁江州女真对垒”^①一句，《裔夷谋夏录》作“十月，以萧奉先弟、殿前都点检萧嗣先帅奚、契丹、禁军、土豪五千，屯出河店，临白江，与宁江州女真对垒”^②，而《契丹国志》作“十月，差守司空、殿前都检点萧嗣先（奉先弟）充东北路都统，静江军节度使萧挈勃也副之，发契丹、奚兵三千骑，中京路禁军、土豪二千人，别选诸路武勇二千余人，以中京虞侯崔公义充都押官，侍卫控鹤都指挥使、商州刺史邢颖副之，屯出河店，临白江，与宁江州女真对垒”^③，内容更为详细，较前二者更接近于《金人亡辽录》原文；而前二者中“奚、契丹、禁军、土豪”这样相似的省略，应非单纯的巧合，而是《会要》有所承袭的缘故。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。故《宋会要·蕃夷类·辽门》中金灭辽的叙述，应该源自《裔夷谋夏录》。

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有大量文字与今本《裔夷谋夏录》相类，而《会编》明确引用“汪藻《谋夏录》”者仅三处，分别位于卷九、卷一八和卷一九，且文字均不见于今本，当属今本的残缺部分。那么，又该如何理解这大量的文字雷同呢？第一种情况是二者文字相类而《会编》所记详于《裔夷谋夏录》，当是二者拥有共同史源但采择不同。如《会编》卷三关于女真风俗源流和起兵始末的文字，根据邱靖嘉的研究，当与《裔夷谋夏录》共同出自《金人亡辽录》^④。第二种情况是《会编》内容源出《裔夷谋夏录》而未注明出处，却非简单地脱漏了引用书名。如《会编》卷一八有“八月十五日乙未，宣抚司奏大破萧幹于峰山，获耶律德光尊号宝检及契丹涂金印”^⑤，该句亦见于《长编纪事本末》，作“八月乙未，王师大败契丹将夔离不于峰山”，其注文言“《实

①徐松辑：《宋会要辑稿》蕃夷二之三一，第7707页。

②《裔夷谋夏录》卷一，第79页。

③旧题叶隆礼撰，贾敬颜、林荣贵点校：《契丹国志》卷一〇《天祚皇帝上》，中华书局，2014年，第115页。

④邱靖嘉：《女真史料的深翻与检讨——〈三朝北盟会编〉卷三研读记》，第211页。

⑤徐梦莘：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一八，第129页。此句干支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明抄本（北京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13年）作“甲寅”，而是年八月十五日干支当为乙未。《会编》纪日干支常误，陈乐素已列出不少（陈乐素：《〈三朝北盟会编〉考》，《求是集》第一集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319-323页），而此处当以日数为准。

录》在二十一日,今从《金盟本末》”^①,则《会编》此句月日与《徽宗实录》不同,当源自《金盟本末》。该句下所记之事计一百五十馀字,未标明出处,作“时奚人饥,斡以阙食,六月领兵出卢龙岭,攻破景州……招奚、渤海、汉军五千余人”^②。而《长编纪事本末·金寇》部分有与此段相同者,仅有个别文字差异,且注明“此《金盟本末》所载”^③,可见《会编》未注明出处的文字,确与《裔夷谋夏录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却非直接抄撮。据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载:“尚书右仆射、监修国史汤思退言:‘故追复显谟阁学士汪藻尝纂《元符以来诏旨》,比修《实录》,所取十盖七八,深有力于斯文。’诏赠藻端明殿学士,诸子与堂除。”^④根据苗文和上文论证,《金人请盟背盟本末》和《诏旨》乃是同一批材料,皆为修《日历》而作。笔者揣测,或许是《金人请盟背盟本末》一书上呈秘府后,被《实录》、《国史》等大量采择(说详下文),而为《会编》所吸收。《会编》序虽言:“如洪内翰迈《国史》、李侍郎焘《长编》并《四系录》,已上太史氏,兹不重录云。”^⑤邓广铭、刘浦江先生认为该句意即徐梦莘并未引用这些官书,而《会编》中未注明出处的内容除脱漏引用书名者外,皆应视作徐梦莘的著述^⑥。笔者亦赞同这一判断。然而,徐梦莘之“著述”绝非向壁虚造,而必有所本;其所抄录、改编、融合的对象,或许便包括了上述官书。而在抄录、改编官书相关内容时,便辗转采录了其所据《金人请盟背盟本末》文字,这才导致《会编》大量文字与今本《裔夷谋夏录》雷同却又未标出处的现象。

总之,由于《裔夷谋夏录》成书较早,与大体同时代的许多史书关系不清,在编纂时又非原封不动地照抄原始材料,其史源情况还远未被厘清。加之今诸抄本错讹甚多,引用此书时应当谨慎,同时参看《三朝北盟会编》、《契丹国志》等书较为稳妥。

三、《裔夷谋夏录》文献价值别议

关于《裔夷谋夏录》的文献价值,苗文称:“成书于绍兴九年的《裔夷谋夏

①杨仲良:《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卷四一四《徽宗皇帝·金寇上》,《宋史资料萃编》第二辑影印广雅书局本,台北文海出版社,1966年,第4356页。

②徐梦莘: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一八,第129页。

③杨仲良:《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卷四一四《徽宗皇帝·金寇上》,第4357页。

④李心传: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八〇“绍兴二十八年九月辛酉”条,第2982页。

⑤徐梦莘:《三朝北盟会编·序》,第3页。

⑥邓广铭、刘浦江:《〈三朝北盟会编〉研究》,《文献》1998年第1期;后收入刘浦江:《辽金史论》,辽宁大学出版社,1999年,第383页。

录》可以称得上现存有关女真兴起的 earliest 记载之一,显然具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;同时,此书又可与《三朝北盟会编》、《辽史》等书中的相关文字相互校勘,对于进一步整理、研究这些基本文献亦具有重要意义。”^①苗文旨在说明,因《裔夷谋夏录》保存了史愿《金人亡辽录》的大量材料,可与《三朝北盟会编》、《契丹国志》等书相互参证,史料价值很高。由于前人对《裔夷谋夏录》一书不甚了解,对于《契丹国志》这类已然被证明是元代书贾伪作之书,和《会编》中来历不明的记载,往往较为谨慎,不敢引据;判断《会编》、《契丹国志》某些记载的史源时,可能亦有偏差。而当《裔夷谋夏录》的情况清楚之后,可知《金人亡辽录》乃是三者重要的共同史源。三者互相参证,便大大有助于提高材料的可靠性,发前人未发之覆。除此之外,该书还有两方面的文献价值需要进一步阐发。

第一,《裔夷谋夏录》并非单纯的文人笔记,而是成书早于《日历》、《实录》、《国史》等官修史书的准备素材,考察此书内容,不仅可以对辽宋金交替之际的史事有更充分的认识,还可以据此书对宋《实录》、《国史》的成书过程和本来面貌有所发见。由于这些官修史书已然散佚,想要尽可能了解其原貌,只能从现存的文献中寻找线索。根据上文所述《裔夷谋夏录》的成书过程,有理由认为此书与南宋《实录》、《国史》都有很大关系。《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记宣和二年(1120)赵良嗣出使金国时,在小注中保留了如下记载:

《实录》于乙亥日书“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赵良嗣、忠训郎王瓌聘金国”,盖因《诏旨》也。《诏旨》则因《金盟本末》,但《本末》不载遣良嗣等日月耳。^②

从这条材料看,《徽宗实录》在修撰时,采用了同为汪藻所修的《元符庚辰以来诏旨》一书,而《诏旨》则采自《金人请盟背盟本末》,即《裔夷谋夏录》。然而,《诏旨》一书实际已经于绍兴八年上于朝廷^③,而《金盟本末》于绍兴九年方成书献上。由此可知,该注文所言亦不准确。不过,大概正是由于《金盟本末》与《徽宗实录》内容上的相似性引起了作者的注意,才有此判断。

此外,还可通过王称《东都事略·附录三》和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四裔考·女真》窥知《实录》、《国史》对《裔夷谋夏录》的因袭情况。王称所撰《东

①苗润博:《有关〈裔夷谋夏录〉诸问题的新考索》,第141页。

②杨仲良:《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卷四一二《徽宗皇帝·金盟上》,第4295页。

③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载绍兴八年十一月“(汪藻)上所编集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诏旨终篇,凡六百六十有五卷”(李心传: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二三“绍兴八年十一月丁未”条,第1997页)。

都事略》多承袭宋《国史》、《实录》^①,李心传即谓“其书特掇取五朝史传及四朝实录附传,而微以野史附益之”^②。其所谓“五朝史传”是指北宋所修太祖、太宗、真宗《三朝国史》与仁宗、英宗《两朝国史》的列传,“四朝实录附传”即神宗、哲宗、徽宗、钦宗四朝实录之附传,乃《东都事略》列传部分的主要史源。经笔者检核,《东都事略》的叙事虽然整体简于《裔夷谋夏录》,但除了开头女真源流的部分应出自洪皓《松漠纪闻》之外,从“辽主延禧立,建中靖国元年也”开始的叙述顺序,却与《裔夷谋夏录》基本一致,皆先叙述天祚帝数次征伐女真失败、阿骨打用杨朴策建立金国,再转入宋金联盟、马扩出使耶律淳政权等等,文字内容也多由《裔夷谋夏录》所记精简而来^③。因《东都事略》成书时《四朝国史》尚未修成^④,其史源当为《徽宗实录》中的女真附传^⑤。如此看来,《徽宗实录》所附女真传应当采录了《裔夷谋夏录》的大量内容。

又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四裔考·女真》篇末称“(金国)自晟至守绪凡八世而亡,其事迹具见国史,以其既窃有中原,故事迹不入四裔之录”^⑥,可知此篇女真传很可能采自南宋在金亡后方才修撰的《中兴四朝国史》^⑦。经笔者核对,其内容和叙事结构恰与《裔夷谋夏录》多有相似之处,尤其是其中某些文字正好与《裔夷谋夏录》对原始资料的“改编”完全一致,如“将自执旗,其下视所向。无尊卑,皆自驭马。粟粥燔肉为食,上下无异品。有大事,适野

①详参蔡崇榜:《宋代四川史学家王称和〈东都事略〉》,《成都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1985年第4期,第23-29页;何忠礼:《王称和他的〈东都事略〉》,《暨南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)》1992年第3期,第55-64页。

②李心传: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甲集卷四“续资治通鉴长编、九朝通略、东都事略”条,第113页。

③王称:《东都事略》卷一二五《附录三》,《“国立中央图书馆”善本丛刊》影印宋光宗绍熙间眉山程舍人宅刊本,台北“国立中央图书馆”,1991年,第1923-1927页。

④《东都事略》于淳熙十三年(1186)进呈朝廷,八月即付国史院,而《四朝国史》列传部分于当年十一月方才上进(详参何忠礼:《王称和他的〈东都事略〉》,第57页;葛兆光:《宋官修国史考》,《史学史研究》1982年1期,第51页)。

⑤由于宋金结盟事在徽宗时期,《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即将“金盟”史事系于“徽宗皇帝”之下,故《徽宗实录》当有女真附传。

⑥马端临:《文献通考》卷三七《四裔考·女真》,中华书局,2011年,第9010页。

⑦《中兴四朝国史》志传部分于淳祐十一年(1251)“命史官分撰”,宝祐五年(1257)年上进完毕,《女真传》之修撰当于金亡(1234年)之后。详参葛兆光:《宋官修国史考》,第52-53页。

环坐,画灰而议,自卑者始”句^①,即与上节所引《裔夷谋夏录》文字相近,皆插入了“粟粥燔肉为食,上下无异品”的描述,必出自《裔夷谋夏录》无疑。由此可见,源自《裔夷谋夏录》的部分叙述亦进入了宋《中兴四朝国史·女真传》之中^②。

第二,《裔夷谋夏录》卷一关于女真源流的叙述,是目前所见出现最早也是最为系统、影响最大的说法。“女真”一名初见于五代时期的文献,而五代北宋时人对女真源流的看法和南宋人颇有不同。北宋文献中最早谈及女真源流者是《宋会要辑稿·蕃夷类·女真国门》的内容,作“女贞,东北别国也,盖渤海之别种”^③,以女真源自渤海国,《武经总要》与之同^④。可见北宋人多认为女真乃渤海人之后。而绍兴九年成书的《裔夷谋夏录》则谓“金国本名朱里真,番语讹为女真,或曰虑真,避契丹兴宗宗真名,又曰女直。肃慎氏之遗种而渤海之别族也……《三国志》所谓挹娄,元魏所谓勿吉,唐所谓黑水靺鞨者,今其地也”,首次将“肃慎”、“挹娄”、“勿吉”、“黑水靺鞨”和女真联系起来,形成一条源流有序的民族史链条^⑤。随后,《裔夷谋夏录》对女真民族史的建构逐渐进入了南宋大量官私史书,最终被元代史臣同金朝方面的材料混杂,形成了《金史·世纪》中的经典叙述。这篇《世纪》不见于元初王鄂所修《金史稿》,而由元末史臣编成,主要文本采自金初完颜勗撰《祖宗实录》,此外也掺杂有宋人记载的内容^⑥。《世纪》起首“金之先,出靺鞨氏……所谓白山黑水是也”一段序言,与后文“金之始祖讳函普,初从高丽来”相矛盾^⑦,却与出于《裔夷谋夏录》、《松漠纪闻》系统的宋人文献及《隋书》、《旧唐书》之“四夷传”颇为相似,当是元朝史官综合中原文献编撰而成,并非金人观念。于此,女真源出“肃慎—黑水靺鞨”之说遂进入“正史”,对后世影响极

①马端临:《文献通考》卷三二七《四裔考·女真》,第9006页。

②承蒙外审专家提示《文献通考·四裔考·女真》与宋《国史·女真传》的渊源关系,不胜感谢。然限于篇幅,或容另文展开讨论。

③徐松辑:《宋会要辑稿》蕃夷三之二,第7712页。

④曾公亮等:《武经总要前集》卷一六,《中国科技典籍选刊》第二辑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九年山西刻本,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7年,第1022页。

⑤孙昊已经开始注意宋人文献对女真民族史叙述的影响,但他认为《松漠纪闻》首先视女真为黑水靺鞨(孙昊:《辽代女真族群与社会研究》,第35页)。然根据苗文的考辨,《裔夷谋夏录》成书在绍兴九年,应早于《松漠纪闻》(至少晚于绍兴十二年),而《裔夷谋夏录》已然建立了女真与黑水靺鞨的关系。

⑥邱靖嘉:《〈金史〉纂修考》,中华书局,2017年,第158-159页。

⑦《金史》卷一《世纪》,中华书局,1975年,第1-2页。

大。如自认与辽金女真有亲缘关系的清人便继承此说,并将其进一步官方化^①。今日辽金史学界对女真民族史的认识,除了受到强调线性民族发展的“进化史观”之影响外,在文献材料方面更多出于从《裔夷谋夏录》到《金史·世纪》的文本系统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裔夷谋夏录》是研究女真早期史,反思流行的“肃慎—勿吉—靺鞨—女真—诸申—满洲”链条的重要文本,其价值不言而喻。除此之外,《裔夷谋夏录》所载“生、熟女真”之分类及对早期女真官号、刑法、旧俗的描述等等,对于早期女真史研究亦有相当的价值,值得学者重视。

四、结语

本文从《裔夷谋夏录》的版本源流、编纂体例和史学价值等方面对该书进行再研究。在版本上,进一步厘清现存《裔夷谋夏录》诸抄本之间的关系,上图清抄本、静嘉堂本和南图本均抄成于清初,静嘉堂本和南图本可能直接出自某一明末清初抄本,而此本又与上图本皆源出明中后期的一个祖本,其余抄本都来自前面三个本子。在编纂手法上,汪藻虽如苗文所言多“杂糅抄撮”原始材料,然亦有一些“融会贯通”之史笔,尤以卷一记载女真源流风俗的内容最为明显。由于今本仅存的一卷半中保留了大量关于辽、宋、金更替史事和早期女真史的重要资料,其前身《金人请盟背盟本末》又被南宋官修《实录》、《国史》大量采择,对于研究早期女真史、辽宋金易代史和南宋史学史都有重要价值。因此,《裔夷谋夏录》拥有不可忽视的文献和史料价值,值得今日史家进一步发掘和利用。

附记:拙文承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老师、邱靖嘉老师指导,外审专家提出重要修改意见,使拙文得以进一步修改完善,在此谨致谢忱。

【作者简介】李京泽,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宋辽金史。

^①阿桂等撰,孙文良、陆玉华点校:《钦定满洲源流考》,辽宁民族出版社,1988年,第1-86页。